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周七月
【资料实录】	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拼刺刀大会纪要	
【各抒己见】	关于反思文革的讨论	罗点点·马晓力
【自由论坛】	文革五十周年：必须再来一次反文革	张 言
【书刊评论】	《迷冬》：一部揭示“文革”核心真相的活史诗	龚道军
【读书笔记】	那些年，背对“红太阳”的牛鬼蛇神们	刘 瑜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 周七月 ·

“不思量，自难忘”。

我有过死刑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没有写过，也很少主动说。对我来讲，那不是什
么高兴的事。我没有心情和本事长期拿这些事当做买卖自己的幌子混日子。

但我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别人写的东西里有时会提到我或“老七”，于是就经常被
问，经常被要求讲述，经常被迫解释。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死刑，“为什么被判死
刑？”、“为什么又没死？”、“是不是周总理救的你？”……虽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
我却有一种被提审的感觉，不得不被迫回忆许多事。

还是自己主动交代吧。脱了裤子割尾巴：一不怕羞，二不怕疼——这些当时的语言，又跃
入我的脑中。

中国的死刑年年有。尤其是“五一”、“十一”前必有一次死刑，几乎成为这两个法定节
日的必要程序。

但七零年春天北京有三次大规模的死刑判决：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这
三次密集的死刑都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我经历的就是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那两次。

几乎在十年前，有友人从美国胡佛塔查到公布我死刑的那个名单和内容，复印了给我。这
个名单是当权者下发供群众讨论发言的小册子，用以表明名单内的人被枪毙是执行人民的意
愿。

这几年互联网发达了，网上出现了这个名单。而一月二十七日 and 四月十八日两次死刑的讨论名单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幸运的是最近又看到王锐先生写的文章《遇罗克处决内情的再探讨及其他》。他居然找到了三月五号名单的手写批示稿！如果再加上网上文章：《文革简论》中第三篇第一章第四节“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王友琴有关顾文选的研究，目前有关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死刑的资料和研究相对是最全的了。

这几份文件和文章中都提到了我。考虑再三，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下我个人四十年前的亲历和看到东西，作为历史的见证。

说死之前要先说活。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强声送进北京宣武区半步桥的北京市看守所的。到六九年六月，大规模的、不间断的审讯已经过去，我在被动地等待处理。忽然，我被单独地命令收拾东西，然后被提出K字楼12筒，穿过看守所大院，走出看守所大门，来到干部们工作和居住的一个院中院里。经过政委的集体讲话，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学习班。然后就是个别谈话，大致内容是：我已经结案，年轻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因为是群众专政送进来的，要等待群众谅解。他们正在做工作，要求我好好改造思想，准备好出去复课闹革命。这距我进看守所，几乎是整整一年。

四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段谈话可能是一头雾水。“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不是阶级敌人。在那不断扩大和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样定性就是生呀；“群众专政”，意思是：不是专政机关在整你，是你们学校的群众在整你，我们没有责任；“送进来的”，不是我们抓的；“要等待群众谅解”，既然是群众送进来的，那就要群众谅解了才能接你出去；“他们正在做工作”，即说服群众谅解，是他们在帮助我；“复课闹革命”，是当时阶段性的革命口号，即要求学校复课，学生上课。这个目标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真正做到。

听了这样的话，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本来就不是反革命嘛，还是党英明！

我那时还真以为一直带着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校徽的俞强声是大学生，不知道他就是公安。我这个专案一直是他具体负责的，和群众无关。

几个月的学习班生活比较愉快，因为有盼头了。大家都留了发，“学员们”陆续也有走的。那时主要的日程是学习，然后就干活，主要是盖房和挖防空洞。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已经很紧张，毛泽东仿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主张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挖洞，就是挖防空洞，各个单位都必须挖的。

盖房就难了，因为那时砖头供应紧张，砌防空洞也需要大量的砖，我们必须得自己找砖以满足盖房和挖洞的需要。我们每天推着车，到处捡砖头，拆旧房。为此我转遍了干部大院（原北京市少管所）和半步桥看守所的犄角旮旯，熟悉了这里的一切，K字楼、王八楼、死刑筒、审讯楼……

我们盖的房在看守所大院西侧，死刑筒院外东面，平房，单件加走廊，好像是办公室。我“跑大墙”（行话，指砌墙）时，给我打下手的是个老人，叫贾俊山，也在学习班。他身材魁伟，鹤发，动作敏捷，手底下利索得不得了，他一边供灰，一边供砖，还把脚底下清理得干干净净，让我老受干部的表扬。他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厨师，曾借钱给马瑞雪，马瑞雪逃到香港后发表讲话暴露了他，结果他成了接济马思聪外逃的罪犯而被捕。

到九月下旬，有一次死刑。行刑队有开道车，吉普车，大卡车，都贴着号，按顺序从干部院里人街北大门开进来，出干部院南门到对面的看守所大门提死囚，仪式感很强。

从死刑筒小院到看守所大门有一条东西向的窄窄的通道，其北侧是看守所大墙，南侧是办理新犯人入狱和存东西的接待室的后墙。这条不长的通道中间还有几道隔门，据押我们干活的干部说，死刑犯从监号提出来后，有脚镣和前铐，进了这个通道后，每一个隔间都有人等，一间将犯人前铐倒背铐，一间负责五花大绑，一间负责绑小绳，等等。执行死刑那天看守所的大门不开，只开一个小门。行刑队的人在小门外凭“粉票”往外领死囚，而看守所的人将犯人推出去。他们是从不出这个小门的。平常也是，有忌讳。

我问“绑小绳”是什么意思。他笑笑说，问那么多干甚？！

大卡车上是身穿崭新军装的士兵，斜挎冲锋枪，手戴白手套，年轻，单纯。我们呢，虽然着便装，留起了头发，大概还是挂倒霉相。所以他们也议论我们：他们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凉了。一天，突然念名单，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学习班小院，走出干部大院，走进看守所，穿过看守所大院，走进K字楼。牢门在身后关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无法判断。从第二天开始就眼看着每天都有犯人成批成批地转走，我们的饭食也从每天两顿窝头菜汤变成临时发的面包和稀挂面。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自己也被转移。汽车、火车和汽车，经过漫长的一天路途，深夜来到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河北省饶阳县。

刚刚适应饶阳的农村看守所的生活，就过年了。阴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几个人又被点名。同室许多人知道我是学习班的，一边帮助我收拾行李，一边恭贺我要被释放了。

我刚走出看守所内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锁上手铐和脚镣，随后被拖上一辆大轿车，而且不许坐座位，只能分开腿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后面上来的人就坐在我分开的腿中央，正好压住我的脚镣，万无一失。

押解的军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除了不断吆喝我们低头，很少说话。

到冀县，车停下。一会儿，又上来一批人。其中有几个也曾是学习班的同学。

几个月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有人是单独手铐脚镣，有人是几个人被串铐起来，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被铐。那次指定我在火车上负责分发面包和水。我看见车厢两头椅子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不锈钢新手铐，数量足够把我们全铐起来。所以这次将我们全副“武装”，我也没有太多想：押解犯人总归是这样吧？

到了北京，我们便被分别押入单人牢房，手铐和脚镣都没有摘。不许出声的大声呵斥，严格的规定，使我感到“坏了”！

我被关的单人牢房就是我几个月前刚刚盖的房子，现在的编号好像是35筒。K字楼是三层12个筒，王八楼虽然是女号，但有一度我被提审的地方就是那里，观察好像是三层，15个筒。这个35筒是根据什么编的号，我至今也不清楚。

七零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门外，见到院子里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等我。他们喝令我坐下，开始给我绑绳子。先是两个裤腿，一边一根，匝紧；然后是脖子，靠着肉，不紧也不松；最后是让我站起来，用一根绳子权当裤带，从后面扎紧。这种绳子很细，北京人叫小绳。

这我可懂了，这就叫“绑小绳”！死刑呀！

命运可没有那么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辆卡车上，运到了东城分局。然后就在东城区各地各单位被批斗。

第一个是吉祥剧院，我过去常去看戏，很熟悉。

被批斗时有三个警察押着我，我必须分开腿低头站着，他们三个人各出一只脚踩住我的脚镣，一边一个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摆出一个没有翅膀的“喷气式”姿势。后面一个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绳套，压住我的头并避免我喊叫。这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姿势，和宣传画上一样。

我一开始还注意听批判词，后来发现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发内容。发言的群众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

习惯之后，我每次登场就只注意陪斗有多少人了。陪斗的人越多，我等的时间就越长，就越累，因为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批判。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是很难的。

在吉祥剧院挨斗不止两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台下满满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坏了。

我的同案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因此，美术学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组织了很多发言批判他，结果是我这个陪斗的人头前的地板湿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东城区有那么几场陪我挨斗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分别站在台角上。我心中称他们为童男童女。后来我认识了那个男的，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个是朝阳区，我只记得去北京挑补绣花厂给田树云和孙秀珍陪斗。两个人我都认识。认识孙秀珍是在学习班，认识田树云是从学习班又回到监号以后。巧的是，我后来又成了田树云夫人的同事。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时租用的写字楼原址就是挑补绣花厂。有时世界就这么小。

海淀区是我就读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所在。我回学校挨斗时没有人陪斗。进场前，退场后，我都极力想看见我同班的同学。可惜，一个也没有看到。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我去得最远的是石景山区。那几天天天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经过市区。在路上看见人们冒着大雪在漠然地拆城墙上的砖，心里估计他们是用这些古砖去砌防空洞，觉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组三人有薛新平，我们学习班的同学。还有一个敦厚的老者，我不认识。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见火炉，薛新平说：真冷呀。我说：你能觉得冷，证明你还活着，享受吧！这时角落里忽然传出：好样的，小伙子，有种！

我扭头一看，说话这正是那位老者。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周存厚。我说：哦，你就是那个躲在夹层墙里十几年的土匪呀？！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夹壁墙里能活吗？江青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后表扬北京红卫兵小将抄家的伟大成绩时提到过这个人，说他们功不可没，挖出了藏在夹层墙中十几年的大土匪。我那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深信不疑呢，但对一个人能生活在夹层墙中十几年也是不太相信的。

就这样，我被批斗了整整六十场。带镣的脚腕每天都淌着血，两个手背都被手铐的关节磨出了溃疡，至今还留着疤痕。

群众讨论和批斗完毕，我从35筒被转移到死刑筒。不像是苏联人建的k字楼，除了功能，毫无美感。我原来从外面看过这个有一点建筑装饰的清末民初的建筑，感觉它是一个古朴的两层楼。这次进去一看，才知道这个死刑筒仅仅是一层。一边十间单人牢房，中间有一道隔墙。牢房门有三层，向外开的铁栅栏门上镶着一层粗钢丝网，厚厚的实木门向里开。三层门下有一个带小门的洞，是送水送饭用的。

室内的暖气被吊在高高的墙上。暖气上面是一个小窗，更高。从窗户可以看见外面斜着一支杨树杈，树杈上孕育着鼓鼓的叶苞。

怪不得呢，里面的一层在外面看就是二层楼。因为窗户高呀。

警卫有两种。一种是在天花板上巡逻的，他们通过扣在天花板上的灯网观察我们。另一种是在走廊巡逻的，他们上班就换布鞋，悄悄地通过镶在门上的单面小镜子监督我们。

这种监督严格到什么程度？！

任何脚镣的响声，都会招来看守。如果我表现得有些异样，比如痛苦。一会儿就会有医生来给我看病，不用报告。我看不到外面，但能觉得就像纽伦堡的战犯法庭监狱，每个牢房外面都站着一个戴着白色大铁帽子的美国宪兵。

房间的水泥坐式马桶在墙角，那里有一个里大外小，像射击孔一样的方形观察窗。无论什么时候去方便，只要站着，就没有人理你。但你只要坐下，身边大门的底窗就会打开，有人送上手纸。方便完起身，水会自动冲下。如果有剩手纸，一定会有手伸进来向你取走。不用语言，不用命令和吩咐。

我是习惯性便秘，在那完全不允许活动的牢房里，便秘就更厉害了。无论我一天去坐多少次马桶，程序都是如此。而且对方绝对耐心地伺候着，不呵斥，不抱怨，不阻止。

我看过一些旧书，知道死刑犯一定得被处死。如果被判死刑的人在等待执行期间突然死亡，狱卒是有绝对责任的。

进来的第一天，还没容我定下神来，就听见一个声音跟看守说：上一次批斗我参加了，但没有枪毙我，说有重大问题要问我……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理我……现在又来了一批……什么时候找我呀……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娓娓地说他要献药方，可以包治百病，普济众生……

更多的是一个人专门和看守捣乱，一会儿要求放风，一会儿要报纸看……从他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滚头筋一样的人，什么都不怕。可以听得见有时看守摘了他的下巴，有时给他倒了背铐，让他吃饭如狗啃，几天无法擦大便，甚至摘过他肩膀的白，但他还闹下去。

生命的欲望可以用各种办法表现，但没有一个人求饶。

后来才知道，那第一个声音就是遇罗克。总和看守捣乱的据说就是马捷生。这是这几个月中唯一用正面冲突表现自己不服意志的人。

除了这些个别的声音，平时牢房里安静得像大海一样，真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

到那时，我的法律状态仍然是“群众送进来的”，入狱已经一年半了，没有拘留手续，没有逮捕手续，没有判决书，但已经在等待死刑。这离不久前被告之将被释放，才三个多月的时间。

怎么等待呢？我知道，哭也没用，笑也没用；求也没用，不求也没用；愁也没用，苦也没用……总之，一切都没用了。因此我也不想这些事了。监号中正好有三本《毛选》，一至三卷，于是每天看一卷，最后真是“倒背如流”了；剩下的时间就背古诗古文，一首一首地回忆，一篇一篇地拼凑；还背过课本，从“一：开学，开学了”开始，逐篇地想下去。

死刑监号绝对不许出任何声响，但我可以在心中唱！先从小唱到大，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想，我会唱哪些歌？

我最后的判决书里有唱外国“反动”歌曲一项罪名，居然。这可能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判决呢，可以证明我是多么喜欢音乐了！

还有，就是反思，反思自己做过的缺德事。我那时就暗下决心：如果能活，绝不再做自己事后会脸红的事。

窗外是几月几号？我几乎不关心了。一天，从第一间监号开始，铁门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在安静的死刑筒中这可是很少有的事。我是第四间，一会儿就轮到了我。小小的监号中忽然进来五六个陌生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夹子，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到案情……这些每次审讯开始都要问的问题。我机械地一一作答，心里想，原来这就叫验明正身呀。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被轰了起来。这天没有发洗脸和刷牙的水。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门底下已经送进来了两个冷窝头和一小块萝卜咸菜。都说临刑前给一顿好吃的，原来也是小说。这顿饭比平时的热窝头和热菜汤还要差。

我来不及考虑这些了，因为身上还有一件比较新的毛衣，我舍不得一会儿它被子弹穿一个眼。我悄悄地褪下了手铐，脱下毛衣，叠好，放在枕头上。又带上手铐，坐在炕箱上，等着他们来提我了。

其实我早发现我的手铐有点大，找到一个角度就可以褪下来。我每天晚上都会在被子里褪下来，舒服一会儿。但睡着前我会带上，以防万一手露出被子被看守发现。

天刚亮，外面传来了车队的轰鸣。我想起了去年九月看到的行刑车队，想起了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崭新的军装，白手套和斜挎的冲锋枪……“他们是改造好的”。

一个门被打开，听得见脚镣的声音从匀速变成越来越快，越来越远……一会儿，哗啦一声，我知道那人是在小夹道中被放倒了。这边第二个门被打开……

一切都是规律的，从容不迫的，就像我在看着那个空空的死刑小夹道。

意外发生了。第三个人出去后，他们并没有开我的门，而开了第五扇门……

我站在那里，听着，直到整个死刑筒又回归死一样的寂静。

一会儿，一个军人看守乐呵呵地走了进来，问：“你刚才在闹什么事？”“我没有闹呀！”“你还不老实，我都看见了。”“我真没闹。”“出来吧，给你换个铐儿。”

我还能说什么？

毫无心理准备的是，他没有斥责我，也没有揍我，始终乐呵呵的。换完铐子，这事也就过去了。

下午居然提审我。我趟着镣，呼吸着有些湿润的空气，走到死刑筒的院子里。太阳真耀眼呀。小院中堆放着刚刚清理出来的行李，一卷一卷的，上面用纸条写着人名，真像一堆棺材码放在一起。

提审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问我怎么想。我说我很理解，要和苏修（那时兴称苏联为苏修）打仗了，为唤起人民的斗志，杀人祭旗是必要的，这种做法古来有之。我年龄太小，没有来得及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这次如果能起到激励人民斗志的作用，冤枉死也值了。

我的态度他们很熟悉，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在被批斗期间，每天晚上回到监号，脚腕的伤口都要上紫药水。上完药，棉花棒是要收回的。有一天看守忘了收回，我就用紫药水棉花棒在一块布上写了没有罪和想念亲人的“遗书”，塞到了被子中。后来抄号（狱中不定期的搜查）时这封“遗书”被翻了出来，存到了我的审讯档案中。

审讯员没有为难我，只是让我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罪行，党的政策大门还是敞开着的，让我争取宽大处理。

为那封遗书，几个看守们的领导专门审讯我，追问是谁给的棉花棒。我坚持说忘了。我怎么能忘呢？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吴胖子，是个少数被留用的老公安。我们挨斗的那些天，无论多晚回来，他都会烤窝头片给我们吃。他有情，我不能无义啊！

一批新的死刑犯马上进来了。死刑筒的生活又那样单调而安静地开始了。我想起了遇罗克当初的话，也许我是下一批？

四月十七号，我又经历了一次验明正身。四月十八号，我又经历了一次凌晨的死刑的等待。但我又被空过去了。

那枝斜挂在窗外的杨树杈吐芽了，长穗了，有了嫩绿的叶子。

棉衣已经穿不住的时候，我被调到了K号楼的大号中。一百多天的死刑筒经历终于结束了。但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最终结果，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关于这次死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补充。

从时间上看，六九年十月的这次北京犯人大转移，与林彪的一号通令有直接关系。在有关文革的研究中，似乎一号通令只是涉及到了高干的转移，鲜有注意北京犯人大转移的。

七零年春天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据说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乘直升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视察，督促加大死刑的力度，增加死刑的人数。这一段历史值得研究。

三月五号北京死刑人数据说是42个。二月十一日公布的讨论死刑名单上涉及47个案件60余人。在这个名单上我认识的人有：

1.田树云、孙秀珍：以他们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大量重要情报”，也不可能胆量和必要索要手枪、照相机和特务活动经费。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司机都是中国人。可见他们之幼稚。这是一个典型的“逼供信”的案件。

我出狱后恰巧与田树云的夫人一个单位。我本想与她聊聊田树云，但每次她都很冷淡地回避了。

对田树云和孙秀珍来说，同年同月同日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吧？

2.傅晓平：我们曾同监号的时间不短。我向他学针灸、日文。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很谨慎。他的案情我完全不了解。

他有一个同案犯，小孩子，叫王亨利，与我们在学习班一块“学习”。他的名字没有进入这个名单。幸哉！

3.段鼎：他肯定没有死，现在在澳大利亚。我和段铎曾同监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文革结束后一直在旅游部门工作。

4.薛新平：也活了下来。我曾经联系上他，但他似乎不太愿意接触这段历史和狱友。恐怕和他曾经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有关。

同一时间，但不知道哪批被枪毙的认识人还有王涛和索家林。他们六七个人是习武孩子，看了电影《独立大队》后按电影中的台词说过要“天地人三不管”的话，文革中被说成了反共救国军（这也是当时舞台上的词），还有司令、参谋长之类的官。就这样，他们俩被枪毙了。活下来的人中有的在我的工厂里工作过。其中有一个人神经病了。估计是他将一群孩子的游戏说成的反共救国军，官称也是他说的。小时候的同伴屈死了，他良心的压力总会有的。

我回大号后，恰巧与刚抓进来的遇罗克手下的一个陈姓“干将”同号。他说讨论遇罗克死刑时，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交代问题。二月那次遇罗克没有执行，又召集他们说遇罗克有重要交待，所以没有死，让他们抓紧机会坦白。随后他就被抓了进来。我问他是否与遇罗克交待有关。他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信。

我觉得有人死，有人不死，有人不死之后又死，与当时当权者的谋略有关。而内幕是什么？远没有真相大白呢。

为什么我没有被枪毙？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周恩来出手相救。以我们家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但我父母事后说，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文革后，邓颖超见过我父母多次，也没有讲过有此事。有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文章中说是周恩来出面干涉的，所以他和我得救了。这是一厢情愿，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说法。

最近还有文章说：“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我不知道他说的“老七”是不是我，但王鹤寿是我的三姥爷。我不知道我三姥爷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作者，在什么场合和作者说的这番话。我三姥爷六七年即由于鞍山事件早于我成为死不改悔黑帮走资派分子，当时街上有毛泽东亲批的“很好，照办”大布告为证。我还给他往监禁处送过东西。他平反也比我晚。他从辽宁朝阳地区监禁地被放回北京时，是我去车站接的。他不可能参加七零年的中央会议，也不可能说得这样的“内幕”。

我多么希望这位作者写的是真的，因为我也想攀这个高。能两次被中央讨论，又两次被周恩来亲自救下，多荣耀！可惜在文革中我们都太渺小了。

我之所以长期不相信“贵人相救”说，是因为通过我的观察，逃过那次“死刑运动”的绝不是我和我的同案两个人。除非周恩来都认识他们。这次王锐先生发现的文件，也表明订名单时，事先对枪毙谁不枪毙谁就已经有所区别了。

我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周总理。因为那时熟悉我们家的中央领导中，只有他在位了。

我出死刑筒后不久被送回河北省饶阳县看守所。一年过去，那里已经有了电灯。

我申诉的愿望一直没有停息过。七三年，经过周密的考量，我写信给家里和给周总理，力陈自己被冤枉的过程和根据。当地“犯人”换季的衣服是允许家属取回拆洗的。这厚厚的信被缝在一个当地“犯人”的棉袄中被其家属取走。我松了一口气，静等事态变化。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被叫出监号。刚出院门，就被绊倒，带上铐子，暴揍！我以为又是死刑前的准备。但没有想到随后被叫进审讯室。审讯室里有三个北京来的人，先让我签逮捕证。我拒绝了，原因是没有任何手续，我已经被关押了六年，这个证签不签没有意义。他们让我回座位，马上又命令我起立，宣布判刑13年。

事情比传奇还传奇。我托的“犯人”是一个小学教员，当地的知识分子。他老婆大字不识一个，因此没有共同语言。他喜欢上另外一个女教师，从眉来眼去发展到暗递情书。她老婆有心眼，暗中偷藏了他们的情书并交给的生产队（当时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人证物证皆在，他

作为坏分子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次他老婆拆洗衣服，又发现信。她理所当然地判断这是他流氓丈夫写给情人的！于是这些信从生产队逐级上交，一直到北京。

北京市公安局为打击我的气焰，决定从重判刑。

我连累了我的同案，深感歉意。因为如果我老老实实在耐心等下去，未必会是这个下场。

出狱后，我找到那个帮助我传信的“犯人”。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我的公司做看门的工作，一直到现在。

判刑后，我在衡水劳改队服刑。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狱中只有我们中队没有按惯例发报纸。三日，我正躺在炕上休息，一个“大”犯人撞了一下我的脚，扔给我一份十月一号的报纸。我看见我父亲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又过了几天，能接触到狱领导的几个大犯人都传言：北京来人了解我情况，要带我回去释放。

几天后这个传言便没有下文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总理逝世。那天正好是我在衡水劳改队被单独关押，准备转监。听到哀乐声，我觉得我完了，国家也完了。

以下两年是国内政治斗争最剧烈的两年。我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端着饭碗，打颤的牙磕着碗沿，怎么也吃不进东西。我母亲作为十一大党代会代表在主席台中间就座的大幅照片给我带来平反的希望。不久，北京来了三个人找我谈话，要求我认罪。开出的条件是：只要认罪就减余刑释放，马上跟他们回北京。我考虑了一下，拒绝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文化部要北京市公安局放人。跟我谈话后，北京市公安局发函给文化部称：周七月自一九六八年改造至今，已近十年，该犯拒不认罪，改造收效甚微。不认罪成为不放我的理由。

又过了一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我被释放了。据保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记录，那时还没有任何职衔的邓小平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直接要人。他明白地说，如果你们认为他有罪，先放出来再审。为此，北京市有些干部在学习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时还专门提到“邓小平说四个坚持，为什么还要求释放反革命分子周七月！”并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

从中不难看到邓小平当时的地位并不巩固，吴德他们对邓小平是不服的。我是否能最终得到平反，也不是没有变数。

释放之后就是密集地过堂，我几乎天天去正义路的中级法院。我发现法庭很不客气，继续拿当时还在狱中的同案的口供打压我，逼我认罪。我不得已，只得写信给陈云，说我和我的同案是同一个案子，同一天，同一个判决书判的刑，为什么这次只放我，不放他？请求立即释放他。当时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是陈云的大秘书，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陈云系统的人，信顺利地转了上去，顺利地批了下来。十二月三十日，同案被释放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我马上约见他，商量法庭的事。我抱怨他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会看不到形势，一味招供呢？他说他确实没有认清形势，并给我道了歉。他那时还记得，在学习班时我也曾经抱怨他不该招供那么多，那时他就道过歉。他说他还是软弱，所以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他这次出来之前，公安找他谈话，要他以后继续合作，他答应了。我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呀。他长叹一口气，说：没有办法了。

我们两个人最后的裁定书是七八年五月下来的，无罪！十年的青春就这样被消逝了。

我曾经根据当时普遍的平反原则，要求销毁所有的材料。法院解释说，当初肯定是冤案，现在又给你平反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现在也不是没有争议。保留这些材料是对你最负责的做法，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将来谁再想翻你这个案也是翻不了的。

我接受了这个解释。

要谈爱情嘛，我也经历过。

劳改期间，一个新分配来的公安女干部对我特别好。她常常找我请教一些业务上的问题。我一出狱，她就追到北京，坚决要嫁给我。她坚称我在狱中就像一个好人，正直，可靠，业务好，是条汉子。

那时我前途未卜，天天过堂，哪敢想这些事！我婉绝了。

在中级法院过堂期间，有一个女孩子突然在路上堵住我。她说她看过我所有的档案和审讯记录，相信我是无罪的。没见我之前，只看那些记录，就爱上了我。我来法院，她一直在旁边观察我，更相信她自己的判断没错。

我根本没有发现有人在观察我，我正在法院受审，更不敢接受一个法院工作人员的爱情，赶忙拒绝了。但她穷追猛打，直到几年后才放弃。

我很感激她们同情和温暖，至今保持着对她们的尊敬和友谊。

十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虽然大环境险恶，但还是好人多！

生活是多么美好！

□ 原载作者博客

~~~~~

## 【资料实录】

### 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拼刺刀大会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地址：西安医学院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习仲勋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与一切反动派一样，也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家伙虽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中揭发了出来，但是他仍不甘心死亡，时时想复辟翻案，在当前抛出了所谓“我的履历”和两份“认罪书”，张牙舞爪。妄图反扑。就是在拼刺刀大会上还不老实交待，百般狡赖。但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这条落水狗批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到会的对质人有安志文（大叛徒安子文之弟、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陈煦（习贼秘书）。大会在“打倒反党分子习仲勋！”的愤怒口号声中开始。

革命群众质问（以下简称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为什么撕掉李立群（高的老婆）揭发高岗的材料？

习：没有，没有。

安志文（以下简称安）：在高岗问题揭发后，李立群写了揭发材料，让习仲勋看，习大发雷霆，当场撕毁了揭发材料，又指示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这个揭发我看过。

习：我是撕了李立群的揭发材料，因为我看材料中牵扯的人大多，有彭德怀、贺龙……。我对她说，我们自己揭发自己的问题。

众：目的何在？为什么又指示写假揭发？

习：我保护彭德怀，当时看中央也没有揭发彭的意思。以后李立群写揭发，不是我指示的。

安：习仲勋叫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送交杨尚昆。

习：没有这回事。

安：你找高宝娃（高岗的儿子）给李立群送过什么东西？

习：没有送过什么东西，因为李立群经常到我那儿来，不需要找高宝娃送。

安：有这回事，李立群揭发材料上都揭发了。

众：第二次的假揭发是不是你指示的？

习：是我指示的，不是写假揭发，而是叫李立群揭发我们自己的问题。

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与他都进行了什么活动？

习：高问题揭出后，中央指示我与高联系，作些工作。我说过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众：说过什么话？

习：我觉得把高岗的问题处理的重了，同情高岗。高岗说他的问题很严重。我说，你的问题还有张国涛的严重？张国涛都没有杀头，如果杀你的头，死我和你死在一起。你有些问题不属实，不要怕。还说，李立群揭发了你的问题。

众：你是否替高岗给毛主席写过信？

习：写过，是我的主意。

众：你的什么主意，你为高岗打听过什么消息？

习：毛主席在杭州向苏联大使尤金说：我们党内出了问题，有大阴谋家。高叫我打听这个大阴谋家指的是谁？我没有打听过。

安：他向高岗说：一定要设法通过师哲（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了解这件事。师哲当时在中央工作。

众：你给高岗说过东北要公审高岗没有？

习：说过，我给高岗说：东北有人提出要公审你。

众：你与高岗还搞过些什么鬼？

习：高岗被管教时，他叫我能不能从××、陈云、彭德怀那里摸中央的底？叫他们给主席说说，看能不能减轻他的罪？

众：你怎么干的？

习：没有，陈云那儿不能去，因为他首先揭发了高岗的问题，彭德怀当时矢口否认他与高的关系，他那儿也不能去。

众：你在高家与高谈话对，为什么不让李立群参加？

习：没有不让李立群参加。

安：当李揭发高问题后，习在高家时，把高叫到保姆房子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李立群参加。

众：为什么谈话要避开李立群？

习：我到高家与高岗谈话对，一般情况下李立群都不参加，这是常事，没有不让李参加。

众：高岗死后，你见高岗他哥高崇义为什么要哭？说过什么话？

习：我没哭。高岗死后，高崇义来北京，我说现在来看不上人了，到坟地去看看，你回陕西去，生活上有人招呼你。

众：高岗死了，看他们对西北人民咋交待？这话你说过没有？

习：这话是我与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反党分子）、李立群谈中央红军到陕北情况时，说把高岗问题处理的那么严重，看他给陕北人民咋交待？

众：说这话目的何在？

习：目的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众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众：你对高老虎（高岗之子）说过啥？

习：李立群说高岗的大衣，猎枪在，给高老虎，我说：猎枪也能打死人，不要拿，到东北去，需要时，我有一枝给他。

众：你的猎枪就不能打死人？还说了些什么？

习：李立群担心高老虎以后的工作问题，她硬说高岗是他的秘书逼死的，要上告中央。我说：我们都跟高岗犯了错误。

众：你对高老虎说：你拿猎枪，人家会说你要当刺客。这话为什么不承认？

习：没有说要当刺客。

安：李立群的揭发材料上有这件事。

习：（张口结舌。）

众：你为什么叫杨芝芳（高岗前妻）给李立群作工作？为什么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去工作？

习：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工作，是因为这里有熟人，如马文瑞等，好照顾她，不是怕暴露我的问题。

众：欲盖弥彰，你是想将李立群调离北京，进一步控制她，以免揭发你的问题。

众：你反毛泽东思想都表现在啥地方？

习：以前与高岗一起反党、反毛主席。以后就是策划编反党小说《刘志丹》……。

众：你学毛选不？你为什么不给下级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习：也学，不经常。毛主席指示每次都传达了。

陈熙：习从来不读书，不学习，不看书。并说：只要有实际经验，处理问题自然合乎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观点。习很少传达主席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

习：过去在工作中实际是这样的。在工作中很少看主席的著作。五四年以前，政治局决议，毛主席指示都传达了。在五四年我主持文委工作时，有一次传达毛主席在政治局讲话后，邓小平责备我说：“仲勋，你给干部传达些什么？这样好不好呀？考虑了没有？”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向下传达主席指示了。

众：你为什么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

习：我当时认为邓小平的话可能是对的，同对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相当以后的总书记，是我的直接上级。

陈：习还说过：高岗一贯未犯过错误，经常宣扬高岗。

众：你为什么宣扬高岗？怎样吹捧高岗的？

习：三三年在陈家坡会议上，提议让高岗在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作政委。三四年高岗因在甘肃正宁县南雨村强奸妇女被撤职，由张秀山代替。张秀山当政委打了败仗，大家让我当政委，我说高岗有经验，还是让高岗当了政委，三五年高岗去西北工委时，我曾给写过一封信，我在信上说，你给我们留下这块根据地，以后不管怎样艰苦也要保住。

众：这是篡改历史，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众：你的反党野心表现在什么地方？

习：三七年吹捧高岗为了向上爬，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高走后自认为是西北的领袖，西北的山主。五二年到中央就和高饶反党集团混在一起。五五年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查，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蒙混过关，当时把关的是邓小平。五九年上海会议叫我当副总理，反党野心又抬头了。支持李建彤写反党小说《刘志丹》，为此开过一次座谈会，我系统讲过一次话，讲把刘志丹写成成熟的革命领袖，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虽然没有讲写高岗，实际上高岗是用了化名，写了高的事实我是同意的，这就是为高岗翻案，用死人宣扬活人，宣扬自己。五八年到西北来，××批准的，到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回到北京。一方面了解大跃进情况，同时宣扬自己，扩大影响。

众：你在攻击三面红旗方面都搞了些什么？在铜川都讲了些什么？

习：在铜川一个农村大队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比外国的工人都好，要是在外国早就造了反了。”“外国”是指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铜川矿上讲：1.政治工作差，2.口粮差，配备杂粮多，3.人口流动大。李启明同去，叫我给中央煤炭部反映。

众：这是在作反革命舆论，煽动群众闹事，搞匈牙利事件。

众：你说过“高岗把情况估计错了，他没你在西北影响大”这句话有没有？

习：说过“高岗没有我在西北影响大”，当时陈熙、薛和P在场。

众：四四年在高干会上说过啥？

习：（吱唔）

安：四四年绥德分区学习小组的组长是李井泉，副组长是习仲勋，他在小组上讲：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只剩下陕甘宁边区，并说，我们从实际中摸索出一条正确路线。

习：我，我说过。

众：你都写过那些文章？

习：在西北写过“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众：是怎样写成的？写了些什么？

习：我指示，陈煦执笔写的。

陈：我写了第一稿习说不能用，后来赵守一、习仲勋等讨论拟出提纲我写的。名义上纪念党成立三十周年，实际用大量篇幅宣扬陕北党的正确领导，宣扬了高岗和他自己，篡改党史，否定毛主席正确领导。这篇文章和高岗在四二年高干会上论调一样，对西北干部影响很深，流毒很广。

众：是不是这样？你给陈煦说了些什么？

习：是这样，给陈煦说些什么，不记了。开始陈写，以后我口述拟了一个提纲，在文章中突出了高岗。

众：你给陈说过什么？你到底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高岗走？

习：确实记不清楚了。意思是陕甘边区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路线，现在看来是反对毛主席。

众：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习：去北京后，六一年四月一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众：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习：主要是反三风，给中央写了报告：1.食堂不能办，2.炼钢铁浪费劳动、燃料。

众：说你放的毒。

习：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的太开，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说过：我看到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都拿去炼钢了，把耕犁也炼了铜。……

众：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习：赞成自留地。

众：你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写道：农民夜里在自留地里干活，真是披星星、戴月亮。过去夜里干是我们命令的，现在完全是自愿。两个夜战不同，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种新气象。写过没有？

习：写过。

众：你在长葛说：“县委干部说，上面的政策不要说群众不信，我们也不信。群众说，政策是老婆的牙，活落的很”。说过没有？

习：说过。

众：你这是假借群众，干部之口，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众：把三反分子习仲勋带下去！

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习仲勋！

陕西师大八一战斗队批习组整理

□ 摘自《凯迪社区·史海钩沉》

~~~~~

【各抒己见】

关于反思文革的讨论

• 罗点点 • 马晓力 •

罗点点：我为什么不愿反思文革？

2016年来了，刚过完元旦，就有人在微信里说：文革50年了，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反思文革。

我却颇不以为然，经粗略归纳，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呼吁反思文革的人有一大目标，即阻止乌有之乡的毛粉队伍日益壮大。且不说乌有之乡粉毛颂圣相当有效，多年来一直呱噪着要回到文革。更不说他们颇得真传，立竿见影，思想指导行动。单看湖南、云南、河南等地，一到圣诞就红旗猎猎，人头攒动，就令人不知今夕何夕，恍若隔世……。

不过，毛粉队伍不断壮大，没文革反思可算不上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他们对确认领袖和政权的合法性贡献巨大，与其说有人投鼠忌器，真不如说他们是另眼相看。所以，反不反思文革和毛粉队伍壮不壮大其实没啥关系。不仅如此，毛粉们的高歌猛进其实该让善良人猛醒：咱这里哪会有挑战了权力的合法性而不面临巨大风险的事？

第二、有人愿意用二战之后德国全社会对纳粹罪行的反思说事。说彻底反思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基础。可他们忘了，德国人当年的反思之所以彻底，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在权力拥有者的自省中展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下跪的不是别人可是德国的总理！

一位兄长嫌我这提法过于简陋，耐心地提点我说：二战后德国面临两种社会思潮，一是德意志的复兴，战败后的德国需要重新燃起民族主义，重建精神和物质家园；二是反思富国强兵之路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民族灾难。前者可能重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法西斯之路，后者不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哈贝马斯提出“宪政爱国主义”使两种社会思潮在一个正确的理论之下得以融合，并形成推动德国和欧洲战后新的复兴之路……。这议论当然比我的有学问许多，但它更让人感到中国的现状无法和当年的德国相比。不仅文化和思想资源的先天匮乏让人沮丧，中国社会未经过基本的思想启蒙，对国家罪恶的反思无从依托。加上没有历史际遇的配合甚至是反配合，文革反思很可能流于表面甚至低俗。

第三条更重要。让我不能不想起上世纪南非种族政权下台后全社会转型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主教写过的一本书名：《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反思文革当然也是为了中国的未来。宽恕和原谅是为了社会和族群的重新弥合，是为了避免任何激烈的动乱和革命。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图图主教担任主席的那个机构开宗明义地被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1. 尽可能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2. 通过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3. 考虑对那些出于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时至今日，南非人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它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为南非今天的稳定与和解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获得那段历史的真相是获得这些成绩的关键！

文革反思在当下缺的恰恰是真相和获得真相的可能。原因不论，想说的是没有真相怎么会有反思？更别提和解、宽恕和未来。我们经历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历史决议，还有莫衷一是的道歉和忏悔，之所以继续撕裂族群，甚至造成新的仇恨，其重要原因难道不是没有起码的真相吗？

这个对文革反思不以为然的单子还可以继续扩展。但是，奇怪的事情却正在发生。尽管分明有巨大风险，尽管应有的反思主体分明孱弱无力，尽管几乎没有真相和获得真相的可能，但文革反思的浪潮仍在涌动。

这是人心的涌动吗？是人类安放良心，拒绝耻辱的本性在涌动吗？碎片化的互联网世界、精致的个人主义和失去中心的家国情怀能给这种涌动带来新的去处和机遇吗？

我不知道，可我却从未有过地渴望知道。

点点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马晓力：

看了点点写的关于反思文革的几点不同意见，我想针对她说的三点谈点看法。

一、点点对反思文革为什么不以为然呢？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点点他们实际上是很特别的另类。他们从一开始乃至文革号角尚未正式吹响前就被无情地随着他们的父母一起给打入了冷宫。可以说从头到尾他们都在一旁冷眼审视和观察着这场看似突如其来，其实早已在伟大领袖胸中涌动的一场“革命风暴”，一场由他亲自出马发动，几乎砸烂了他和跟随他的战友们共同打下的一个新政权，一片新天地。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闹剧，以至成为世界史上最惨烈的、人数被裹挟最多、手段最卑劣的、毫无人性、沉渣泛起的最腐朽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浩劫、大罪恶、大悲剧。可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夺了参加文革的权利，他们是根本连一个正常的参加文革权利都没有的人，是一群极特殊的游离在文革之外的最清白最无辜最冷静的人，是从所谓的红二代队伍中、原本是同类的革命阵营中最早被踢出的少有的干净的人，就等于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就被甩出局了，最终又被迫在父母亲人被残酷批斗关押的恐惧面前不得不表态、不得不检讨和划清界限的人，否则他们连生存权都有极大可能被夺的人，连被挨整也是被置于这个洪流中而根本没有任何选择权的人。那他们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值得反思文革呢？他们不仅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都被早早夺的人，况且还是一些心理和生理完全没有成熟的未成年人！在他们内心深处除了恐怖和创伤还能有什么呢？可以说他们是最有权利对文革说不的人！在我心中他们是连骂人都没学会的最干净、最少文革恶习的文明人。所以他们只是文革的受害者，最有权利和有资格不反思文革。

二、点点的担忧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尚不具备全面反思文革，我们无法和德国全民族反思二战相比，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因为站在德国反思前沿的恰恰是他们政权的首脑，

而我们今天反思文革的不过都是些孱弱的小民或是些被出局的曾经是体制内的边缘化的人。这种反思不仅撼动不了什么反而具有很大的风险。我想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境遇，尽管我们是已被边缘化和沦为弱势群体的人，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再不反思文革，历史将不再给我们机会！我们失去这样的机会心灵将永远不得安宁！我们不能不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和有所交代。尽管我们非常无力非常弱小，但是我们每一个弱小的人，都在觉悟起来，都正在迈出走向自觉的第一步，那就会有第二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向前迈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每一个所闻所见的真相，我们也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相。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讲出真相，真相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如果没有人出来反思那么谬误的阴霾将越来越弥漫。我们每个人的记忆积累起来重合起来，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相。今天我们已然站出来，我们就决不会再后退畏缩。我们有责任让后人知道真相！尽管它被一直封闭着回避着，但我们必须打破沉默，撕开这个沉寂而又沉重的幕布！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要努力向可能达成和解的方向迈进，如果连揭示真相我们都不敢去做，不去反思的话，恐怕和解的一天只能是越来越远，是永远到不来的。

三、点点的提示很重要，意在我们多一些冷思考，多一些对困难局面的思想准备，少一点热闹的大轰大嗡，要做长期长远艰苦打算，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文革的浅层次上。也就是说反思文革是我们揭示真相的起步，是将以往文革中破碎的记忆一点点拾起，无数记忆的碎片叠加重合在一起，就越来越接近真相。如果说十年前我们还不具有这种勇气和觉悟，那么今天既然敢于这样想和做，觉悟者就要拧成一股劲，抱成一团做下去，撕开一个小缝隙，哪怕这个口子很小很小也值得。我们反思的意义不仅仅在追责也更不是狭隘的报复，而是重新审视我们走过的路。如同王小鲁所言：反思我们共同曾有过的不堪的那段历史，重新认识我们曾经认同甚至确信无疑的价值观，重新鉴别我们曾用以判断是非的准则。这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反思精神，文革的红海洋还是有可能重演的。

马晓力 2016年1月10日

~~~~~

## 【自由论坛】

文革五十周年：必须再来一次反文革

· 张 言 ·

—

今年是中国文革发动50周年；文革结束40周年。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变化天翻地覆。然而，历经五十年春秋，文革余毒并未肃清。对文革的争议一直没有休止。文革并未盖棺定论。如今的中国，文革的幽灵游荡，文革回潮的阴霾弥漫。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坛波诡云谲，错综复杂，风雨如晦。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焦点。重新讨论文革，正本清源，澄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彻底肃清文革影响，已是当务之急。

习近平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撰写的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中引用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

同样，今天我们对文革历史的记忆的丧失，亿万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重新记忆，再次唤起心灵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

虽然事过已经半个世纪，五十年前这场劫难对中国人精神心灵造成的深沉伤害至今未愈，对中华民族文化、道德、思想造成的冲击、创伤仍在，文革带来的紊乱和影响至今仍未消除。文革遗害或及千秋万代。

十年文革期间到底迫害死了多少人，至今难于作出准确统计。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  
（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些都是官方统计。

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的除大量民众，还包括中共许多主要领导人及高级将领。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开国元帅贺龙、陈毅等。

受迫害的领导人也包括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彭真、陆定一、薄一波等。邓小平的儿子被迫害致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遭受迫害，累及全家，习近平本人曾两次被关少年劳教所。前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父辈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前领导人江泽民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批斗至休克。

文革中有大量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杰出优秀人物被打击迫害致死。据统计，在这场迫害中自杀的知名人士就超过数百人。如《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吴晗、著名作家老舍。还有如：储安平、傅雷、翦伯赞、熊十力、荣国团、闻捷、范长江、杨朔、言慧珠、上官云珠、严凤英、潘天寿、丰子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貽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罍、张肇铭、李芝卿、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董秋斯、满涛、丽尼、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等人都在文革中自杀。

这都只是众多死难者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死难者是普通民众，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近年来，也有些良知者在收集文革中普通死难者的名字，但相信能统计到的仍只会是沧海一粟。毕竟数十年过去，岁月蹉跎，千万白骨已成灰。许多当事者、见证人也已逝去。

十年文革中大量的珍贵文物、文化瑰宝被毁坏，大量的传世典籍、字画被焚毁，大量的传统建筑、雕塑、碑刻被打碎。孔府、孔庙、孔墓被砸，连华夏祖先炎帝陵墓也被平毁。这些被焚被毁的文物属天文数字，无法统计，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掠走文物的千百万倍。关于这方面，已有人搜集整理出比较详细的资料，在网络可以搜索到。

十年文革造成的生产力停滞、经济倒退，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毁等等，在此暂不赘述。

而文革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人伦道德的破坏，对人们精神心灵的摧残扭曲，更是无法量化，难于估算的灾难。学生打老师，儿女斗父母，夫妻互相检举揭发，朋友、邻里之间互相告密举报。如此等等。这些都已经彻底打破了人性的底线，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基点，破坏了人伦准则。

所谓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成为奴役人们思想的符咒。摧残折磨人的心灵和肉体，彻底摧毁剥除人的尊严和自尊，是文革最残忍恐怖的整人方式。多少人在文革中苦煎熬，生不如死。这些灾难发生在五十年前，但精神心灵痛苦将会是长期的永远的。一个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化道德体系一旦被毁坏，一旦失去道德底线，必将延祸无穷；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扭曲，就可能影响终生。中国现在许多人的思维、行为方式，都带有明显的文革痕迹和特征；中国今天许多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根源，都与文革有关。

五十年后，在21世纪的今天再看文革，只要稍有一点人道情怀，只要有起码的文明观念，只要有一般的是非判断能力，都不会对文革反人性反人道的性质持异议。面对千百万亡魂，任何为文革辩护的强词夺理都不值一驳。杀死千百万人，任何对文革冠冕堂皇的美化都是狗血。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文革是绝无仅有。文革的罪恶罄竹难书，文革十年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历史之一。

## 二

四十年前，当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华大地一片欢呼，多少人喜极而泣。以批判文革为中心，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大量深刻揭露文革罪恶的文章出现在报刊；许多文艺作品都以反映和批判文革为主题。全国人心鼓舞，意气风发，呈现万马奔腾景象。此时的中国存在普遍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批判文革、解放思想的形势下全面出发，造就了今日中国超凡的经济成果。

人们痛定思痛，深切反思，大彻大悟。举国上下无人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许多人都信誓旦旦，认为中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巨大苦难，再也不会重蹈文革那样的覆辙。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中，这就等于在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文革。

但是，《决议》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没有追究毛应负的责任，而是试图将文革与毛切割，否定文革——肯定毛泽东。这是一种矛盾的悖论。否定文革而肯定毛泽东，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说不通，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此后更没有将文革罪恶历史写进教科书，以警示子孙后代。这就为日后评价文革的混乱埋下伏笔，为文革死灰复燃留下祸患。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障碍。

当然，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承受了相当的压力。事实上，文革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乃至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文革一脉相承。彻底清算毛将拔出萝卜带出泥，危及中共统治的根基。《决议》既是权宜之计，也属无奈之举。

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小平心里还是明白的。

但是时光到了21世纪，事情并没有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几十年洗脑的结果，许多年轻人对文革已一无所知；许多过来人对文革也日渐淡忘。所有这些离正确评价文革、评价毛越走越远，离正视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正是在这种气候环境下的产物。

时至今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游荡，文革回潮的妖风阵阵，真实情况令人惊心动魄。一些公开的网站大张旗鼓为文革辩护，为江青、四人帮翻案，攻击污蔑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矛头实际也对准执政当局）。他们公然在清明节给江青上坟祭拜，发表文章美化江青、四人帮。也有些毛左在各地公开集会，搞演讲和纪念活动，为文革、四人帮招魂。他们并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施以暴力。一些刑满释放后的文革余孽四处招摇放风，毫不收敛。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的确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专权、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等。医疗和教育改革的失败也是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不少民众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思想迷惘和困惑，完全忘记了文革的深沉苦难，容易被煽起不满情绪，错误地怀念文革和赤贫年代的平均主义，重新追寻那曾经给他们带来深沉灾难的乌托邦。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腐败层出不穷恰恰是政治改革不到位、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他们也不了解文革中大量存在权力腐败的事实真相。这些人纷纷叫嚷要“再来一次文革”，成为文革翻案者的重要群众基础。

必须指出，因为缺乏透明资讯，没有公平公正的理论平台，就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研究文革也出现许多误区，有些观点近乎荒谬。如，有人提出什么“人民文革”论；有人论证文革中的“自由民主”，等等。所有这些谬误都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否定和清算文革造成混乱。

文革中的所谓“四大自由”，实际上是在极权操控下的一种骗局。文革时期大量事实表明，谁要是在大字报、大辩论中有触犯毛泽东、林彪、江青的言行，必大祸临头，重则死刑，轻则坐牢，还将株连家庭亲人、朋友。文革中因此而获罪的不下千人万人。文革时期所有集会、结社都在专政控制之下，都只能在维护毛思想路线的范围框架中进行。否则就视为反革命。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与真正的自由民主毫无关系。

文革前期确也批斗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客观上为长期受压迫的民众泄了愤。但这些都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为打倒刘少奇等政敌）的需要，是一种阴谋策略。这绝不是什麼“民主”（这种批斗也多采用暴力）。事实上这些“走资派”大多数很快就恢复权力，整个体制结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许多重新掌权后的当权派都对参与造反者秋后算账，疯狂报复。受害的仍是民众。

当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人们提心吊胆，道路以目，动辄得咎。就是在亲人面前也不敢随意吐露真实思想。户口、档案、粮食配给制成为枷锁，限制了人们起码的自由。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流动、迁徙自由。连出差、探亲都要出具证明。有些地方农民赶集也要开路条。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集中营。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反修防修。应该说毛有浪漫的革命情怀，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有江山变色之虞。而事实上文革前的中国政治局势相当稳定。但毛有严重的帝王思想，兼有封建帝王特有的精神疾病——疑心臆想症。他所谓反蜕变的实质，是防篡位，防失去权力。防蜕变、反修防修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动机是为了排除异己，涉嫌泄私愤、打击报复（毛曾被迫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为大跃进错误检讨，因此与刘少奇结怨）。如果毛真的是出于公心，为“反修防修”而搞掉刘少奇，那么在刘已经下台、完全失去权力后，目的就已达到。此后对刘少奇、彭德怀等骇人听闻的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就已没有必要，也不近人情人理。这种迫害与什麼防“蜕变”、“反修防修”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也有人将文革罪恶发生归咎我们民族的素质。这更是本末倒置。必须承认，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现作反思并承担应有责任。文革毕竟是通过不同个人才能实施。但文革的发动者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将人性中的邪恶集中诱发出来，鼓励纵容这种邪恶，并将这种邪恶发挥到极致。主要的责任当然是文革发动者组织者。任何民族在独裁统治特殊环境下都有可能被人蒙蔽利用，走向邪恶。以德国民族为例，这个被公认为相当理性的优秀民族，在二次大战中即被希特勒法西斯煽动纵容，整个民族卷入成为凶残的战争机器。污染、糟蹋了这个民族，还要将责任推给这个民族，还有更荒唐无耻的吗？

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国报刊许多文章普遍称文革为“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定义是比较准确的。文革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整人史、丧心病狂的迫害史。面对千百万亡魂，面对数以亿计被迫害、精神心灵遭受痛苦折磨的民众，无人能给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绝不可能得逞。中华民族如果不能从文革灾难吸取教训，如果重蹈文革覆辙，将万劫不复。

文革唯一的正面意义，是在客观上让遭受深沉磨难的中国人觉醒，认清专政制度的本质。但是要真正走出迷局，摆脱思想桎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彻底否定文革，不全面正确评价毛，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就不能以文明的正面形象屹立于世界。

□ 原载《共识网》

## 【书刊评论】

《迷冬》：一部揭示“文革”核心真相的活史诗

• 龚道军 •

## 一、诡异的官方“文革”定调与长篇小说《迷冬》的出版

长篇小说《迷冬》去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家胡发云计划中的“文革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书的出版，意义重大。对于没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文革”这两个字基本只是个空洞的符号，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当然，你可以认为，通过查阅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就能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如果持有这种想法，那就太天真了。因为文献可以伪造。既然是史无前例，就一定罪恶累累。犯了罪又没有得到揭发和清算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掩盖罪恶，就会把罪恶打包封存，推卸罪责和编造弥天大谎。

本人出生在“文革”期间，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这位比希特勒还残暴的独裁头子才离开人世。那时候，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去参加校外活动，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红旗，一路高呼革命口号。“四人帮”倒台后，我们一帮小学生天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喊着“打倒王张江姚”的口号。可是，就我这样一个算是经历了“文革”尾声部分的人，“文革”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仍然是空洞的符号。在我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毛发动学生全国上下四处捣鼓破坏，四个帮凶趁机乱整人，然后毛一死，四个坏东西就被抓起来了。接着全国人民欣欢鼓舞，开始迎接太平盛世。这种印象非常具有代表性，完全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的基本认知——包括经历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人。因为这是官方对“文革”的一个基本定调。

但是，读了胡发云先生的《迷冬》，你就会意识到，十年“文革”仍然是一个云遮雾绕的领域，历史的迷雾并没有消散。这个定调只是官方在用一个表面事实在掩盖着更大的真相。真相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普天之下，最诡异的莫过中国历史。而中国的历史，最诡异莫过于近现代史。

## 二、二度夭折的武大“文革”演讲与当代没有历史来路的中国人

在写作《迷冬》之前，胡发云先生曾在武大演讲过一次“文革”。那次演讲，社会各界反响十分强烈。之后，他又与校方商定，决定再继续深入演讲这个主题。但到了临近演讲的日期，校方突然通知说腾不出场地，演讲无限延期。这个无限延期一直延到胡发云先生的《迷冬》杀青出版。《迷冬》面世后，胡发云先生再一次与武大校方商定好“文革”演讲事宜。

当时，校方规划好了场地，胡发云先生也准备好了演讲稿。双方共同敲定了演讲日期。见事情一帆风顺，胡发云先生便在微博上发出了通知和邀请，邀请文学界和思想学术界的各路豪杰前来武大。志踌躇满志的胡发云先生甚至还在博客上绘出了武大校园的具体路线图，让前往参加的人好按图索骥。可是，就在演讲的前两天，校方突然通知演讲场地已挪做他用，演讲无限期延期。不言自明，这一切显然不是校方在故意推脱搪塞，而是官方宣传部门在背后刻意阻挠。官方为什么这么怕？胡发云先生究竟想告诉公众什么？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文革”也就才过去三十多年，当年的无数的经历者现在也都还健在，还用他胡发云三番五次的摆出一番架势絮絮叨叨吗？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这是在中国——一个谎言无孔不入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民众知晓的一切与国家和政治有关的事，都是经过了官方的谎言过滤器过滤了一般的。经历了参与了，并不等于了解内情，不等于了解原委，不等于知道核心真相。

很多事情就像照相的底片一样，黑的部分出现在照片里就是白的，白的部分出现在照片里就是黑的。除非经历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有着非同寻常的敏锐观察力，才有可能站在常人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来把握纷乱的世事。而作家胡发云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深刻的思想者。当然，这也与他的出生年龄有一定关系。1949年出生的他，正好与红朝同龄，仿佛是专门为见证这个太平天国的翻版王朝而生。从他出生前到出生后，这架专政机器从未停止过杀戮。他17岁那年，“文革”爆发。以他的年龄优势，得到清醒地见证了这场动乱的全过程。

现在，这位思想者不仅要用文学书写的方式，而且还要通过演讲的方式把他对历史的认知告诉所有经历和未经历这场浩劫的人，让人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来路。——在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历史来路的人，他们不了解过去的惨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不了解当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不了解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 三、小说《迷冬》的故事梗概及文本特色

小说《迷冬》讲述的是，“文革”时期，一群政治派别不明显的灰五类少年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故事。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来展示时代的风云变幻。小说以宣传队员的活动为主线，内容广泛涉及宣传队成员们各自的家庭及社会背景，这样写来，就已经不是一群少男少女间的简简单单的故事了。由于宣传队成员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顺着他们的家庭顺藤摸瓜式的写来，通篇小说就呈现了一个枝蔓横生盘根错节的完整的社会体系。从高于到普通革命家庭，从商人手工业者到普通工人家庭……几乎应有尽有。这样庞杂的效果，也正是胡发云先生想要达到的。

胡发云先生的小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悲剧性的小人物置于社会的社会大背景下，让读者全景式的看到在时代的车轮面前，小人物命运的身不由己。这样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如实反映社会现实，二是能把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紧密结合，从而深化悲剧效果。而不是像很多回避政治的犬儒作家那样把人物从时代背景中抽离出来，把一切小人物的悲剧全都写成与社会无关的个人悲剧。人是社会性动物，任何个人的悲剧都是时代大背景下的社会悲剧。这种写作方法在胡发云先生的小说使用频率很高，比如他的中篇小说《死于合唱》中的费普；中篇小说《葛麻在1976—1978》中的葛麻；中篇小说《媒鸟5——一个说话人的传记》中的齐齐……等等。《迷冬》当然也不例外。《迷冬》只是胡发去先生“文革”三部曲的一部开端之作，只写了十年“文革”最重要的的第一年。在《迷冬》这一部分里，里面的主要人物应该已经基本出场，人物的命运还将会有等进一步一一展开。

胡发云先生小说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代“史”，即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弥补“史”的缺憾。这一点，早在他的中篇小说《葛麻在1977—1978》中就充分体现了出来。小说毕竟不是史书，小说要描述的东西都是鲜活的，是要以生动的故事表现出来。因此，这对小说家来说就徒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顾及小说的艺术性。但是，胡发云先生去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的《葛麻在1977—1978》堪称经典。一般来说，小说家是没有责任去进行历史构建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时代，当历史学家在暴政面前集体缺席时，有良知的小说家才会主动的去担当部分史学责任。这样的时代通常都是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中国的毛时代。十年“文革”则是毛时代中最黑暗的十年。

由于“文革”的特殊性，一般性的史料，哪怕是绝对真实的，也无法生动的还原历史的全貌。而小说却能够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只要忠实于历史，常常比史书鲜活得多，这也正是史诗性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文革”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乱”。乱得像一团乱麻。就算有人亲身经历了，也不一定能说出个道道来。可能有很多人至今都搞不清楚，红卫兵为什么会分化成这么多派别，为什么派别之间要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每一个派别背后又是谁在支持，支持者各自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种种的疑问，都在胡发云先生的思想脉络中和小说文本中被梳理得条理分明。因此，你只须读小说《迷冬》，就能对纷繁复杂的“文革”了然于胸。

### 四、小说《迷冬》中暗含的政治板块密码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迷冬》开篇是从主人公多多参与“文革”的行动开始的。多多是一个非常有音乐天赋的年轻人，后来几经周折，纠集一批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政治倾向中立的宣传队。在这个动荡不安年代，他们到处演出，走遍全国。其间发生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小说并没有直接描述“文革”开端之初，第一批红卫兵所犯下滔天罪恶的场景。但读罢全书，你就会发现，作家处处都在提醒你，“文革”的罪恶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批红卫兵和他们的支持者们犯下的，后面长时间的持续动乱也正是他们头两个月种下的恶果与祸根。当然，这一切都是伟大领袖故意放纵的造成的，这些滔天罪恶激起巨大民愤。然后毛回过头来，利用被激起的民愤去收拾已成为利益集团的官僚权贵，把他们的权利夺过来集中在自己手上。于是，以底层平民子弟组成的第二批红卫兵以人数的绝对优势开始反扑。这样一来，第一批由红色官僚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就只有招架之力去保爹保妈了。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在湖城，这当然是作家虚拟的一个地名。但谁都猜得到，这个湖城其实就是武汉。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武汉的“文革”非常特殊，它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保爹保妈派红卫兵在武斗中取得胜利的城市。而且，“文革”期间的武汉，还发生过一件差点改写了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武汉军区领导一度软禁了来武汉视察的毛，高层随后紧急调兵才解救出来。小说中提及到了这一重大事件，只是写得很隐晦，没有指名道姓的明说。由于武汉军方的态度是站在官僚集团这一边的，因此武汉这边的保爹保妈派红卫兵们表现得特别凶残。为了保住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说中的梁老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人物非常具有代表性，基本可以代表红二代的普通心态。十年后，毛两腿一蹬，见了马克思，权力又回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手中。

又过了二十年，梁老二们成了这个国家政权的实际把持者。如今，他们都是台上的主角，要么成为了军方少壮派和军头，要么成了高层政要，要么成了亿万富豪，要么成了海外的寓公……总之，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把持了这个国家后，这种与生俱来的凶残梁老二们还一直保持着，把本阶级的利益看得比天高。稍有冒犯，一律赶尽杀绝。

说白了，“文革”中无论文斗还是武斗，归根到底是官僚利益集团为巩固本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中间层和底层的人们诸多利益诉求的矛盾的集中表达。为什么毛能轻而易举调动中间层和底层巨大的社会力量，原因就在这里。这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利益被谁占去了？一方面是毛的工业军事强国思想和他的国际政治野心占了很大一部分国民资源，另一方面是官僚利益集团在社会资源方面的占有和掠夺。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毛治国能力有限，没把蛋糕做大。

毛死后，官僚利益集团的代表邓改变了策略，他把蛋糕做大了，但后来又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由让官僚集团占了一大部分社会资源，让广大中间和底层的人只分了一少部分社会资源。于是，在“文革”结束后的第十三个年头，终于发生了大规模学潮，再次爆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危机爆发之后，官僚利益集团采取了强硬手段镇压。镇压之后，又继续做大蛋糕以图暂时的稳定。如今，这个利益集团与广大中间和底层的人们在利益诉求上的矛盾又处于不可协调的状态。不用说，今天当政的梁老二们，在本性并没有改变多少。在这临界点上，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动荡。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是不是为保全本阶级的利益又要亮出昔日“文革”式的凶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赶尽杀绝？

□ 原载《独立作家》

~~~~~

【读书笔记】

那些年，背对“红太阳”的牛鬼蛇神们

• 刘 瑜 •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说法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那个年代的故事，想不好看都难，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等等。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我总觉得更残忍的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倒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因为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后代，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像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翔、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革命的血雨腥风席卷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透明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告诉你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栗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翔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被赶尽杀绝。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象张九龙、刘凤翔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因为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追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会必然变得猥琐，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地缝间细细簌簌地成长。

□ 摘自《中国好学者》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